

P231-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十五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续）……………龙 跃（1）

九、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与反“清乡”的斗争

前哨的行进……………李士俊（11）

——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前驱者之一林夫烈士

土地革命时期的浙南妇女斗争片断……………省妇联 市妇联妇运史征集小组（21）

温州市党史资料征集与编写专题目录……………（27）

为反对平阳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全国

党政军报学暨各界同胞书（资料专载）……………（38）

浙江温州中共党史学会成立……………（41）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十五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续）……………龙 跃（1）

九、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与反“清乡”的斗争

前哨的行进……………李士俊（11）

——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前驱者之一林夫烈士

土地革命时期的浙南妇女斗争片断……………省妇联 市妇联妇运史征集小组（21）

温州市党史资料征集与编写专题目录……………（27）

为反对平阳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全国

党政军报学暨各界同胞书（资料专载）……………（38）

浙江温州中共党史学会成立……………（41）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续)

龙 跃

九、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与反“清乡”斗争

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向浙南各级党的组织传达了大会的准备情况、会议的经过、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浙江省的代表和第二届省委委员的选举结果以及各项决议、文件，并贯彻执行。各级组织在贯彻过程中都很认真负责。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全国抗战形势逐步进入敌我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况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以后秘密颁发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对于肃清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到了省党代表大会前后，国民党五中全会的这些反共政策逐步贯彻下来了。浙南的环境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逐步逆转，抗战初期那种热烈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气象已经消失。国民党为了准备反共，对地方政府中的主要行政人员作了调整，排挤了比较开明的人士，而代之以反共顽固分子。比如，比较开明的第八区（温州市）行政督察专员许宗武去职，而换上了反共老手张宝琛；比较进步的平阳县长徐用被调走，而调来的却是杀人魔王张韶舞；后来被瑞安绅士以“宰我瑞民”的万民匾“欢送”出境的吕律当了瑞安县长；顽固分子李文凯当上了泰顺县长。其他有关县的行政主管人员也作了更换。军队方面，温台防守司令部司令黄权比较进步，虽然没有调走，但在顽固派包围之中，而且上面又调来了一个特务分子朱震生来担任政治部主任，监视他。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平阳、泰顺、鼎平和福鼎等县，有的公开

逮捕我们的干部，有的秘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的人员中包括准备接任浙南特委书记的郑丹甫（东南局已决定我为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回省委机关工作。丹甫被捕后，我继续留在浙南兼任特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陈平、鼎平中心县委妇委主任蔡爱风，以及福鼎县委宣传部长林永中（被捕后逃出）和廖春生、林阿合（均保释）。省委两次派统战部付部长吴毓同志到国民党平阳县政府交涉释放我方人员，均无效。而且不久又逮捕了平阳县统战部林夫及在我党领导下的《平报》总编辑黄藻如。同时发生暗杀事件三起，被害者五人，其中有泰顺县东北区委书记，其余四人均均为不脱产的党员和基本群众。

自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共合作，我们在浙南取得公开合法和半公开合法的地位，赢得了两年左右的和平时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也有时间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也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警惕性没有过去那样高了。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城市和沿海平原或交通较便利的地方，对山区工作，有的县还来不及做，有的县有所放松。和平麻痹思想很容易出问题，必须立即改正。因此，我们在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的过程中，着重对干部党员进行了政治时事和政策的教育，主要是讲抗战形势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讲浙南国民党当局搞磨擦，制造事端，环境正在逆转；讲改变作风，克服干部、党员中一切暴露突出的现象；讲秘密工作的原则，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要严格分开，不得混淆在一起。提高干部、党员的警惕性，严防国民党在军事上向我们党的组织特别是对我们的基本地区发动突然袭击。

浙南党的组织从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后，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浙南党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由原来不到一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六、七月又发展了一些，增加了六倍多。这对浙南党来说，增加了大量新的血液，增强了党的力量。这些同志中的大部分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经过了群众运动的锻炼，有的是与我党长期一起工作的基本群众。但这些党员毕竟是在和平环境中入党的，难免有的质量较差，或是同路人，甚至也有个别坏人混进党内。因此

在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时，根据省党代表大会后省委的补充指示，我们坚决按照“巩固重于发展”或“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办理。对于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予以洗刷，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对部分质量不高的党员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有少数党员（主要是城市或其它重要据点里的）入党时因特殊原因和受到环境限制来不及举行入党仪式的，补行了入党仪式，以加强他们的党的组织观念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

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的根据地都建立在省、县、区之间的山区，有的是在丛山之中。抗日战争开始后，因为形势和任务不同了，我们根据上级的规定，基本上以国民党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这样做，对推动城市、平原地区的工作有利。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地带坚持斗争，仍然要十分注意其统治力量比较弱的边缘区。所以在一九三九年冬开始，我们考虑到浙南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可能性，逐步加强了省际、县际、区际以至大乡之间的山区的工作，使我们在农村中的立脚点更巩固。

在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我们广泛宣传省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告全浙民众书》以及《对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可以向党外宣传的内容。后来，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大量印发了两次宣言：一次是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告浙江各界同胞书》、《告浙江保安团书》（因为这时候浙江各地都发生保安团逮捕、枪杀共产党员的事件）以及《给中间人士书》。第二次是我们自己翻印八路军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宣言》。这些文告和宣言代表了广大人民甚至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的心愿，使我党中央的政治主张直接和群众见面，影响很大，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等谣言是个有力的反驳。但这次散发宣传品的方式，有点不策略，一个晚上，几乎在浙南地区的城乡所有的交通要道和大村庄全都贴遍了，有的还把宣言偷偷地放到国民党县长和公安局长的办公室抽屉里。这样做，固然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但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暴露了自己的许多地区以至一些

人的党员身份。一九四三年冬，我们散发党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和新华社社论《质问国民党》时，就吸取了这个教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宣传资料送到有关人士手里，再由他们在亲戚朋友间传播，对一般的群众则进行口头宣传，这种方式，实际效果要好得多，也不会暴露自己。

在民运工作方面，这时候几乎所有的群众救亡团体都已被国民党摧残殆尽，唯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实际上还在我党的领导下继续做了很多工作，直到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才被撤消。原来的职业团体，如工会、农会、妇女会等此时作用也不大了。只有一批工人夜校、农民夜校、读书会和妇女识字班，因目标没有救亡团体那么显著，这时还没有被国民党取缔。我们继续加强了对它们的领导，并且又建立了一批夜校和识字班，老的新的加起来共两百多所。我们结合教群众读书识字，宣传抗战形势、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消息和革命的道理。抗战初期出版的一些刊物大部被取缔了，但我党领导的《海防前哨》、《战时商人》和《游击》等刊物，在温州城区工作同志的努力下，千方百计想办法，继续出版了几期。还有“前哨”剧团，也还在活动。一九四〇年三月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伪中央政府，温州学生还组织了一次反汪运动，上街游行示威。

以上是我们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时的一个大体情况，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浙南基本地区召开，浙南的同志感到极大的光荣，在贯彻党代表大会精神时格外认真，带着崇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进行工作。这一点，至今对我还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很快在华北华中被我党打退了，但他们的反共行动并没有停止。一九四〇年四月，浙南的环境急转直下，顽固派对我酝酿已久的武装进攻终于公开发动了。他们纠集部队，向以平阳北港为中心的瑞、平、泰三县交界处开始武装“清乡”，同时也波及到鼎平边。这里是我们的主要的老区，两次浙江省国共双方谈判、挺进

师部队集中训练以及省党代表大会召开都在平阳北港，浙南特委机关也长期住在这里，来往人员频繁，目标比较大。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想一举扑灭我们的领导机关，搞垮我们这块基本地区。他们先制造谣言，说“四月廿八日共产党要在瑞、平、泰地区暴动”，作为进攻我们的借口，同时又掩掩盖盖地把武装行动说成是“推行新县制，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突击运动”。国民党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亲自率领浙江保安第八独立大队和平阳县县长张韶舞一起进驻平阳北港，设立督剿办事处，以保安副司令凌九霄兼任瑞平泰督剿专员，坐镇北港指挥，加上瑞、平、泰三县自卫总队和福建省福鼎县前岐等地的民团共约十五个连的兵力。另外以平阳为主从各县抽调了一批特务、警察和反动分子组成五百多人的清乡队，在“以军事行动掩护政治进攻，以政治进攻达到军事行动的目的”的反革命策略的指导下，大举向我们进攻。有趣的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平阳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名义上直属于国民党县政府，也被编入“清乡队”随军队下乡。政工队员采取了许多方法，保护群众，还送出过情报，使我们能作好准备对付顽固派的进攻。

当时我们方面的情况，除特委有两个短枪班，一个班保卫机关，一个班在浙闽边境恢复和发展工作外，其他的全是赤手空拳的地方干部和不脱产的党员，而国民党顽固派却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可见他们的反共是何等坚决！对我们说来，这是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为了坚定同志们的斗争信心，我们在党内，主要是在平阳和瑞平泰地区党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说明这次顽固派的进攻，既有全国反共高潮的影响，也有浙南的历史根源。虽然这两年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但两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各不相同，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比如，在抗战动员方面，我们主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废除军队中的打骂制度，改善士兵待遇，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国民党则相反，有钱的不出钱也不出力，老百姓既要出钱（繁重的捐税和公粮），又要出力（出兵出工）。征兵舞弊重重，对待

壮丁如囚犯，打人骂人遍于军中，对抗战军人家属疾苦漠不关心。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主张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基层政权民选，公务人员要廉洁奉公，刷新政治。国民党顽固派却不给人民以自由，任意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强迫民众接受指派的土劣党棍为乡（镇）保甲长，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政治上死气沉沉。在改善民生方面，我们主张减租减息，公平负担，压平物价，奖励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和难民饥民。国民党却加捐加税，支持地主反对二五减租，物价飞涨，生产好坏无人过问，对人民生活的痛苦熟视无睹。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赢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极端仇视，他们无事生非跟我们搞磨擦，最后竟发展到公开向我们作武装进攻。但国民党顽固派这种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又斗争又团结的原则，我们在政治上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我们取得了省委的同意，发表了《为反对平阳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党政军报学暨各界同胞书》（编者注——原文见本期38页《资料专载》），以平阳县常委林瑞青同志等人的个人名义发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浙江省政府、各报馆、各团体和各界人士广为散发。告同胞书把张韶舞等顽固分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人民的罪行，有根有据地加以揭露，痛斥其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表明了我们严正的抗日、团结、进步的立场。这份告各界同胞书散发之后，中间人士和开明士绅对我们坚持斗争深表同情，反映很好。有的士绅反映“这封信的文字也写得好，义正辞严。当局宣传‘共产党只是一群暴徒’，与此信所给的印象截然不同”。

当时，平阳北港区共有二十一个乡，连同附近的地区，顽固派分期分批轮流在每个乡派一个连和一个清乡队。召开乡、保民大会时，重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法西斯滥调，大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谬论。这些调子，人们早就听厌了。在基本地区，我党的政治影响深入人心，国民党这些反动宣传，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清乡队还强迫群众背诵

“总理遗嘱”、“国民公约”，唱“国民党党歌”。群众大多数是庄稼汉，既不会背也不会唱，常被罚跪罚站打手心。就是读了几年书背得出唱得来的也是有口无心，越背越唱越反感。有一次清乡队在风卧乡要一群小学生背唱，小学生背唱了以后，反过来要清乡队背唱，有的清乡队员既背不出也唱不好，被学生起哄取笑一顿。

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攻的侧重点是武装“清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们所谓的“以军事行动掩护政治进攻，以政治进攻达到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也是指“清乡”而言。“清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整理保甲，清查户口。撤换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保甲长以至乡（镇）长，换上反共的国民党员和地主富农，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基层政权。但在我们群众工作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他们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即使换上了国民党员和地主富农，我们也是有办法对付的。清查户口，是把群众分成“良民”与“莠民”。“莠民”指的就是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清乡队员把所谓“莠民”暗中记下，然后军队于夜晚包围逮捕并乘机抢劫放火。对捕去的人员严刑毒打，强迫自首自新。残酷杀害政治面目已经暴露、立场坚定的党员和基本群众，对未暴露的党员和一般群众也要几经周折用重金才能保回来。开始，由于有些同志缺乏经验，警惕性不高，吃了大亏，以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倾家荡产。敌人最疯狂的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天，在山门街搞集体屠杀，用轻机枪扫射，一次就打死我们十二位同志。老红军蓝山标同志（福建长汀县河田乡人），曾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担任过管理排长，因年老体弱又是革命残废军人，不能随部队到前方抗日，留在平阳风卧乡官尖地方安家落户，也在这一次被敌人捕去残酷杀害于水头街。蓝山标同志是我们多年的老战友，他的牺牲，我至今回想起来还十分难过。后来我们从这个血的教训中总结出几条经验：凡是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党员和平时同我们来往较多的基本群众，晚上集中到安全地点睡觉，轮流放哨，防止敌人袭击；将被敌人通缉的党员组成临时训练班，经过学习后再以三人至少二人一组派回去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做既保证了党员安全，又锻炼提高了

干部水平。同时着手建立武装工作队进行自卫。

顽固派“清乡”的再一个内容，是发“良民证”、计口授粮授盐，企图限制我们的党员和工作人员的活动。在国民党上下贪污舞弊的情况下，“良民证”实际上等于商品，是可以金钱买的，也可以通过统战关系搞到。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就是从没有户口、也没有良民证过来的。计口授粮授盐是国民党过去进攻江西苏区时用过的老办法，但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不同了，平阳是有名的产粮县，也产盐，多数人家有余粮，私盐多于公盐，国民党无法控制。我们机关和地方工作人员人数又少，生活虽然艰苦，但很少断过粮和断过盐。

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扑灭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特委和县委两级机关，从根本上来打击我们。他们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式是突然袭击，有时集中几个连向山区一个主要目标围攻，有时分头向几个目标进攻，有时通过乡（镇）保甲长动员和强令大批壮丁队配合军队一起大搜山。但是壮丁队绝大多数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和同情我们的劳动人民，他们假装积极，估计我们有人住的山区，带着敌人走大路，口里大喊大叫冲呀！杀呀！向我们报信；估计我们没有住人或没有住过的山区，相反地带着敌人走小路爬高山，在树林、灌木丛或茅草中钻来钻去，拖得顽固军疲惫不堪。四个多月中，国民党军队一起向我们进行了三十多次突然袭击和进攻。但我们机关人少转移方便，特别是有广大群众掩护，如鱼入大海，敌人奈何我们不得。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是群众的力量，保证了我们四个多月反武装“清乡”斗争的胜利。群众还想出许多办法愚弄顽固派，除上面讲的搜山带路以外，还有两件事，群众主意很妙，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事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张宝琛在水头街召开瑞、平、泰三县清乡联席会议后，五月十三日在水头街召开一万多人的民众大会，张宝琛大放厥词，污蔑我党，甚至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当年讲的“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为露骨的反动话也搬出来用了。有个狗腿子想为他助威，站起来大喊“打倒共产党”的口

号。群众一声不响，沉默抗议。这狗腿子再喊时，台下一万多群众在我地下党员带头下突然之间一齐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大汉奸汪精卫！打倒汉奸卖国贼！声音震撼会场，响彻云霄。张宝琛、张韶舞、凌九霄等面面相觑，只好跟着一起喊。群众说：今天的会“气死张宝琛，笑煞老百姓”。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敢开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了。第二桩事是在六月间，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两个机关各有十二、三个人，分别住在北港区凤卧后面东西两侧的山上，国民党顽固派大概嗅到了一点消息，调来了一个连，又集中了一千多名壮丁队，准备搜山。顽军连长将部队和壮丁集中起来训话，一个群众利用两天前日本飞机在水头街上空侦察后，大家恐惧敌机的心理，大喊一声“飞机来了”，一千多人趁机一哄而散，搜山计划就此告吹。

在顽固派武装清乡时，我们在基本地区之外领导了几次群众运动，除了上面所说的反汪大游行外，瑞安县委书记在莘塍发动了千余群众参加的闹米风潮的斗争，平阳县委书记在江南区领导群众反走私漏海的斗争，没收了奸商企图资敌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基本地区的斗争，从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

在这期间，永嘉县国民党顽固派也于八月十七日在温州搞了一次突击大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十七、八人。

这次四个多月的武装清乡，国民党顽固派要搞垮我们以平阳北港为主的瑞平泰地区和扑灭我们的领导机关这两个主要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我们的机关仍然在这个地区活动，群众更加拥护。总而言之，不论是干部、党员还是群众都受到了一次考验和锻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敌人在“清乡”中所使用的手段是极其残暴毒辣的，一共屠杀了我们三十七位同志，其中干部九人，党员二十七人，基本群众一人。这些同志在敌人屠刀前面，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其中除老红军蓝山标同志外，还有一位陈观音同志（平阳山门人），是平西区委不脱产的委员，他被捕后，一句话不说，顽固派把他捆在柱子上，割掉他的耳朵，他大骂顽固派是土匪是法西斯，顽固派再将他舌头割掉，他瞪着眼睛怒视顽固派，结果敌人用刺刀一刀一刀把

他刺死。人们称他为“铁汉子”、“硬骨头党员”。四个月中被捕四百多人，房屋烧掉五座，被抢掠和敲榨的财物无数，据当年平阳县的估计，这四个月中仅平阳基本地区党员和群众的财产损失即达六十二万五千余元。

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发动武装清乡后，东南局和省委对我们都非常关心，曾给了我们重要的指示，主要是要我们依靠群众，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政治上打击敌人，以达到坚持斗争的目的。九月间顽固派的进攻告一段落后，特委遵照省委转来的东南局的意见，我在胡景斌同志的协助下起草了一个《四个月来浙南斗争的总结》作为浙南特委向东南局和浙江省委的专门报告。当时大江以南顽固派军事进攻的地方不多，这份总结得到东南局负责同志的重视，还给了我们批示、表扬。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这篇回忆录关于反武装“清乡”斗争这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当时那份总结的内容写的。

（待续）

一批老同志先后来温访问

今年以来，曾在浙南地区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谢文清、张金发、陈挺、苏渊雷、郑丹甫、胡开明、陈平、黄耕夫、杨进、林平、吴昭文、叶龄银、周丕振、林艺圃、李士俊、杜永康、徐贤议等老一辈同志，从外地先后来温州访问。他们深入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与当地老党员、老游击队员欢聚畅谈，回顾历史，查证与核对有关史料，以便更好地撰写回忆录；参加党史座谈会，提供珍贵的斗争史料；同时还看望一些烈士家属。他们的来访对老区群众和党史工作者是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前 哨 的 行 进

——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前驱者之一林夫烈士

李 士 俊

今年杜鹃满山红遍的季节，我们在“上饶集中营”囚禁过的几十位老战友，从祖国各地来到了闽北山区，在崇安县的赤石镇对岸，祭扫了“赤石暴动烈士陵园”。

松柏环绕的烈士陵园里，埋着我们当年亲密战友的忠骨。青年木刻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前驱者之一的林夫同志的遗骸，也在其中。

四十年过去了。在这块留有我们战斗足迹的土地上，人民经历了腥风血雨，逐步建设起美好的生活。抚今追昔，更激起了对烈士们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 张 血 染 的 照 片

四十年前，在郁郁苍苍的武夷山下，崇溪流水，声声呜咽，人民在苦难中生活、挣扎、斗争。一支五百多人的“抗日囚徒”的行列，在国民党特务和宪兵的押解下，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由北而南踉跄地跋涉着。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中午，烈日当空。我们被押解到崇溪河边的一个古老的小镇赤石街，等候过渡。两眼充血的特务们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催迫民工撑着小船和竹筏，赶快渡我们过河，想在傍晚前赶到目的地——下梅村。

可是，人多、船少、河阔，分批过河，一个来回，至少得二十

分钟，任凭特务们如何恫吓，我们三队和一、二、五四个队过河就延续了几个小时，轮到第六队过河时，已经红日偏西了。

河的对岸，是一片开阔地，连接着起伏的丘陵；丘陵尽头，就是雄伟的武夷群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同志曾经在这一带活动，留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夕阳的辉映下，武夷山在向我们召唤，老区人民在向我们招手。六队的同志一上岸，按照秘密党支部事先定好的计划，指挥暴动的同志发出了宏亮的命令：“同志们冲啊！”刹那间，近百个同志象一把大扇子似地散开来，奔向武夷山，这就是有名的“赤石暴动”。

林夫同志参加了这次暴动。当时，他痢疾未愈，加上长期牢笼生活的折磨，身体极度羸弱。在暴动之前，队伍在崇安休息时，陈平同志曾关切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坚定地说：“没有问题。就是跑不动，也不能拖累集体的行动。”暴动时，他勇敢地涉过水田，步履艰难地向前奔跑。当宪兵们的子弹在他身边和头顶呼啸的时候，他还顽强地在丘陵地带匍匐前进，刚要登山，不幸中了宪兵的子弹，受了重伤，重新落入特务的鹰爪，遭到酷刑拷打。他很坚强，没有吐露一句有关暴动组织情况的话。第三天，被枪杀在赤石附近的虎山寺侧。他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还只有二十八岁。

据后来掩埋他的宪兵透露，他死时左手还紧紧地捏着一张被鲜血染红了的照片：他和鲁迅先生的合影。

早在一九三四年，林夫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

“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M·K·木刻研究社，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所没收了。”林夫就是这个木刻研究社的社员。那时候，他用刀和笔，积极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木刻，控诉旧社会的苦难，揭示新社会的必将到来。他的很多作品，都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使内容更加充实，技

艺日益精进。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林夫的木刻作品，曾经参加过两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第一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在北平、上海等地展出，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选好四十余幅作品，准备出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林夫同志也有一幅作品入选，鲁迅先生为这本专辑写了序，可惜这选好的四十余幅作品（包括林夫的木刻），在青年木刻家金肇野家中存放时，因金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这些作品也就散失了，这“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终于没有出版。仅存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篇序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时，鲁迅先生亲自来看了展览，与几位青年木刻家促膝谈心，谆谆教诲。林夫紧坐在鲁迅先生左边，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鲁迅先生讲话。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片。在林夫被捕以后，在黑暗的国民党监狱中，在残暴的“上饶集中营”里，他什么东西都丢了，唯有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在斗争的严重关头，他悄悄地拿出这张照片，深情地看了又看，有时，还传给我们看。他说：“我们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我们应当象鲁迅先生那样坚持韧性的战斗。”

这张照片，鼓舞了我们狱中不少同志斗争的信心和力量。无怪乎林夫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还紧紧地捏着不放。现在，这张血染的照片不知落在何处了，但在《鲁迅全集》（旧版本）第六卷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他那专注的神情，令人觉得他还活着，永远活着似的。

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家乡平阳敖江认识林夫同志的。他中等身材，瘦削的脸，眼睛有点斜视，却很有神，常常穿着一件布长衫，一派书生气。那时，他是中共平阳县委的统战部长，常到《平报》

来指导工作。《平报》是地下党办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公开出版的报纸。它在浙南几百万人民的心中传播着革命的真理，点燃起抗日的烽火，有很大的影响。

我入党的第二天，组织上就派我到《平报》协助编副刊。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深怕做不好工作，心中很不踏实。记得第一次见到林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鼓励我说：

“小同志，欢迎你到报社工作，初生之犊不怕虎嘛，不要怕，大胆地干！”

他摸了摸我的头，笑了笑，接着说：“干革命，比写文章、画画，都要难呀，有时还有危险。要勇敢，又要小心，要好好地学。”

他讲话的声音，有点沙哑。听说他生过颈淋巴结核，动过手术，影响了声带。

他很少谈到他自己。从别的同志口里，我才知道：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从上海回到家乡平阳。这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就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刘英、粟裕同志曾在这一带活动。林夫回到平阳后，就到粟宣同志兼任校长的山门抗日干部学校负责美术宣传工作，画了很多裕传抗日救亡的宣传画，吸引了不少农民群众。一九三八年三月干校结束，粟裕同志率领一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和干校学员去皖南新四军，他和山门干校的干部连珍同志留下来，担任新四军南浙宣传队负责人。

这个宣传队有二十多名队员，都是山门干校毕业的，是一批具有爱国热情、富有理想、憧憬共产主义的小青年。他们活跃在浙南的平阳、瑞安、泰顺一带，翻山涉水，穿乡过城，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据连珍和林斤澜同志回忆，林夫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平日沉默寡言，但在农村宣传讲解抗日救亡道理的时候，却滔滔不绝，令人鼓舞，有时直讲到原来沙哑的喉咙发不出声来。他外表文质彬彬，却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气和负责人的架子，队里挑水、劈柴、烧火、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干，从不后人。他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所以小青年们都很喜欢他，接

近他。

他调到平阳县担任统战部长之后，还曾去丽水工作过一段时间，与木刻家郑野夫一起搞木刻运动，编了一本《五月》木刻集。

他那时候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但他从来没有讲起他的家庭，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乐于助人。秋风起的时候，他看到《平报》一个年轻的同志生活困难，只穿一件单衣，就脱下自己身上的毛线背心，送给这个同志。

用刀和笔战斗

林夫调到平阳县以后，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到报社来一次，问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新的消息，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他很善于做工作。一次，他看了我写的一篇抨击一个资本家走私的短文，指点说：

“资本家的走私活动是应当批评的，但他们还不同于汉奸，不能把他们说得同汉奸一样坏。不能光顾写得尖锐，骂得痛快。”

他自己，就是很善于用他的刀和笔，宣传革命道理的。他曾经在副刊上发表过诗，更多的，是木刻。

他的木刻，题材广泛，刀法粗犷简洁，黑白对比非常强烈。记得有一幅木刻，画面上是一个劳动妇女，背着一个婴儿，在硝烟弥漫中流浪。它唤起了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流亡者的深切同情。也有直接反映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以鼓舞士气，驳斥“战必亡”的谬论。最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征集到砖刻《轰》，可以说是他这方面作品的一件代表作。这幅砖刻，创作于一九三八年，塑造了两个英勇的抗日战士，正把炮弹轰向敌人的阵地。远处战火弥漫，地上野草丛生，黑白灰三色配合得很有节奏感，给人以动的感觉。全画线条古拙，造型简练，刀法自如，刻风粗犷，既发挥了版画本身的艺术特点，又吸取了传统的汉砖风格，说明他的美术基础是深厚的，艺术造诣是高超的。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又一次维护了鲁